

Doi:10.20063/j.cnki.CN37-1452/C.2025.04.002

论《田间诗学》的学术取向

郝苗

山东大学 文学院, 济南 250100

摘要:钱澄之在《田间诗学》中有意强调汉儒师承传统、凸显汉儒传承经学之功,以突破宋学在明末清初对学术的统治力,目的是重树汉学权威。但因钱澄之个人学养偏重宋学,所以他对宋学的抨击往往过于保守;另一方面,钱澄之晚年艰苦的生活条件以及他传承师学的意图,又令《田间诗学》中大量承袭了何楷《诗经世本古义》的相关内容,影响了《田间诗学》个性化特征的表达。不过,钱澄之在《田间诗学》中以汉、宋兼采的注经方式,回应了宋代以来“尊德性”与“道问学”的辩证问题,为经学在清代的传承做了有益的探索。

关键词:《田间诗学》;钱澄之;诗经学;汉、宋兼采

中图分类号:B24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5)04-0008-09

钱澄之(1612—1693),原名秉澄,字饮光,晚号田间,是明清之际著名的遗民学者,所撰《田间诗学》是清初重要的诗经学著作,被徐元文盛赞为“能实见其所以然,而非悬揣漫测以求苟异者”^[1]。钱澄之受明中叶以来汉学复兴思潮的影响,在其撰著的《田间诗学》中广采汉唐学者之说,并以宋明学者之见与之互相发明,形成了不拘一家、兼采汉宋的著书特点。目前学界对《田间诗学》汉宋兼采特点的研究虽有关注^①,但多对此研究不深,对于该书如何调和或取舍汉宋诗经学^②、对汉宋诗经学的偏重,以及钱澄之兼采二者的原因等问题,均缺少较为深入的探究。基于此,本文拟从钱澄之对宋学的清算、援汉济宋的注经方式和钱澄之的注经目的三方面,对《田间诗学》

的汉宋兼采这一特点进行探究。

一、重申汉代经学权威

宋代理学家们一反汉唐学者重考据训诂的治经方法,转而将治学的重点放在发掘经书中之义理方面。理学家们在建构理学体系的过程中,试图借助经典的权威性为他们的新理论提供支撑。实际上,经书的权威性质一方面在于其本身的价值,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历代注家对经书的阐发,也就是所谓“传”的价值。而宋代疑古思潮的出现,恰恰动摇了“传”的权威,新的注解于是更倾向于从经文本身立论,而非一味执着于前说。就像郑樵、朱熹等理学家们,因认为《诗序》出自“村野妄人”之手而弃置不用的做法,正是他们破

收稿日期:2025-03-06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74批面上资助项目“汉碑引《易》与汉代经今古文问题研究”(2023M742103);2022年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易邮》整理与研究”(22CWTJ67)

作者简介:郝苗(1997—),女,山东济南人,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在诗经学史类的著作中,如胡朴安将《田间诗学》置于清初的历史背景下,指出了该书与同时期诗经学著作一样,具有杂采诸儒,“于汉唐以来之说,不主一人”的特点(《诗经学》,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84页);又如戴维也指出该书具有“汉宋兼采”的特点(《诗经研究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23页)。此后,在对《田间诗学》的研究中,如周挺启的《钱澄之〈田间诗学〉研究》指出了该书对汉、宋诗经学兼采的特点,同时也肯定了该书“开启了有清一代汉宋并行、尤重考据的学术风气”的成就(《钱澄之〈田间诗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第22页)。然以上诸说对《田间诗学》中如何兼采汉宋之学缺乏更为细致的说明。对此,于浩则指出,《田间诗学》尊序,采汉唐学者之说有不同于宋学的一面,然“钱氏之学仍以宋明理学为主,并且程朱之学与阳明学并重”(《明末清初诗经学研究》,武汉大学2016年博士论文,第130-133页)。该研究无疑对《田间诗学》所谓“汉宋兼采”的特点做了进一步说明,但是该文在说明钱氏之学偏重宋学的问题时,所参用的《田间易学》的相关内容,以及钱氏书信、序文的例子均非《田间诗学》中的例证,对该问题的说明仍缺乏有力论据。

②本文所谓“诗经汉学”“诗经宋学”“诗经清学”,均采用洪湛侯《诗经学史》的说法:“诗经汉学”,即自汉至唐以训诂为特色的古文经学派;“诗经宋学”,即自宋至清初以朱熹为代表,注重义理、略于训诂的学派;“诗经清学”,即以顾炎武提倡考据,研讨“诗本音”为发轫之始,以乾嘉学者为中心,从而形成的一个诗学学术流派(《诗经学史》,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55页、第362页、第493页)。

除旧说、借经以宣扬理学的表现。这种注诗方式不断曼衍所造成的一大恶果,就是“我注六经”逐渐被“六经注我”的治经方式所取代,经典也因此成为注家借古人之口传达自己思想的工具。时至晚明,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当学人们试图借经书来凝聚共识时,始觉经学的尊严早已被宋以来学人疑经改经之风所伤,为彻底扭转这种经学研究的危机,最根本的方法就是申明经学传承的连贯性,重新树立经书不容篡改的权威。

基于此,钱澄之强调汉儒师承有自,能得孔门真传。汉儒是否真正传承了孔门的精神,一直是宋人攻击的关窍。宋人普遍认为:“凡《诗》《书》《六艺》之文,与夫孔、孟之遗言,颠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沈于魏、晋、六朝者,至是皆焕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2]12710}宋儒强调自身得道统之正,将汉儒传承道统的作用一概抹杀。如此一来,宋儒疑经改经、舍弃汉儒之说而重新解读经书的做法就在情理之中了。在此背景下,钱澄之在《田间诗学·古序考》的开篇即阐明了汉儒的师承:

毛公《诗》出,称得传于子夏,不与三家同。以授毛萇,然其本亦出荀卿云^①。毛公者,鲁人,名亨,作《训诂传》(按,当作《诂训传》),以授赵国毛萇。时人以亨为大毛公,萇为小毛公。传至东海卫宏,字敬仲,从九江谢曼卿(按,当作卿)受《毛诗序》^②,善得《风》《雅》之旨,今传于世。郑康成氏遵畅毛旨,特为之笺,又申明毛义,以难三家,三家遂废。^{[1]26}

依钱氏所言,《毛诗》系出孔门,自先秦至汉,经文、经义的真实性得益于连续不断的师承而保存下来,汉儒之说必然有高度的可信性。所以,宋人否定汉人传经之功的谎言即不攻自破^③。钱澄之为了重新树立经学权威,就要厘清孔子以来的学术传授体系,将汉儒重新纳入道统传承的体系之中。与之相应的,钱澄之又对宋儒处于千载之下却轻易否定汉儒之说的做法进行批判,他认为:

然吾观《序》之首句,其所从来者古,毛公因是以作《传》,而卫宏受之,乃增益其说,以足成《序》文。而朱子谓首句已有不得诗之本意者,亦核论也。大抵汉去古犹近,学者皆有师承,递传而失实者容有之。然未若后人之无所禀受,

而一以己意推测,得则偶合,失则全为妄说矣。若郑夹漈之于《国风》,大半日以淫奔者是,故吾宁右汉也。^{[1]32}

郑樵和朱熹疑《序》的学说影响一时,而钱澄之也仅仅是肯定了其中朱熹所持《诗序》“首句已有不得诗之本意者”的观点,且认为郑、朱二人所言多以己意揣测“得则偶合,失则全为妄说”之说,并不能作为确凿之论。与之相反,汉代正处于“去古未远”的时代,《诗经》的本貌得益于师承关系流传下来,即便有失实之处,也天然地比宋儒之说更为可信。正如王鏊所言:“汉初六经,皆出秦火煨烬之末,孔壁剥蚀之余。然去古未远,尚遗孔门之旧。是时诸儒掇拾补苴,专门名家,各守其师之说。其后郑玄之徒笺注训释,不遗余力,虽未得圣经微旨,而其功不可诬也。宋儒性理之学行,汉儒之说尽废,然其间有不可得而废者,今犹见于《十三经注疏》。”^{[3]5-6}祝允明于《学坏于宋论》中也认为:“经业自汉儒讫于唐,或师弟子授受,或朋友讲习,或闭户穷讨,敷布演绎,难疑订讹,益久益著。宋人都掩废之,或用为己说,或稍援它人,皆当时党类。吾不如果无先人一义一理乎?亦可谓厚诬之甚矣。”^{[4]263-264}二人在反思宋人否定汉学的做法之余,均肯定了汉儒的传经之功,可见明中叶之后宋学已有逐渐失势的迹象。至明末,钱谦益在肯定汉儒之学“微言大义去圣贤之门犹未远”的同时,又提出了治经“必以汉人为宗主”的治学理念,认为治学应遵守“汉不足求之于唐,唐不足求之于宋,唐、宋皆不足,然后求之近代”^{[5]1760}。可见,“去古未远”是明代学者复兴汉学的一面旗帜,他们以此来说明宋以前汉儒传承经学之功,倡导汉学的复兴。钱澄之在《田间诗学》中亦将“去古未远”作为尊奉《小序》、征引汉儒之学的理据,以“学者皆有师承”,否定了后儒

^①钱澄之此论源于何楷《诗经世本古义》。何氏注该句称:“毛公名亨,或云鲁人,或云河间人。《序录》:‘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大毛公。陆玑云:子夏传鲁人曾申,申传魏人李克,克传鲁人孟仲子,孟仲子传根牟子,根牟子传赵人孙卿子,孙卿子传鲁人大毛公。’《初学记》云:‘荀卿授鲁国毛亨,作《诂训传》,以授赵国毛萇。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萇为小毛公。’”详参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5页)。

^②钱澄之认为《诗序》首句(即所谓古序)作于采诗之官,先秦时期已有之;而《诗序》首句之后的申续之言,作于卫宏。荀卿所授予毛公之《诗》,已包括所谓的古序,故此处卫宏从谢曼卿处所习《毛诗序》,当指古序,即并不包括首句之后的申续之语。

^③强调汉人继承孔门之学的做法在明代并不少见,如张朝端的《孔门传道录》、朱睦㮮的《授经图》、邓元锡的《学校志》、王圻的《道统考》等,均意在说明汉儒的经学传授的连贯性,否定了宋儒所谓程朱继承孟子之道统的说法。

“无所稟受”的诸多学说,选择“宁右汉”的治学途径。这正是钱澄之顺应汉学复兴潮流的结果。

钱澄之在《田间诗学》中还批判了宋儒为阐发义理而穿凿附会的解经方式。如程大昌认为:“自《邶》至《豳》,无一诗在数也。享之用《鹿鸣》,乡饮酒之笙《由庚》《鹊巢》,射之奏《驹虞》《采蘋》,诸如此类,未有或出《南》《雅》之外者。然后知《南》《雅》《颂》之为乐诗,而诸国之为徒诗也。”^[6]在《诗总论》中,钱澄之反驳该说,称:“曹魏时,得汉雅乐郎杜夔,能歌《文王》《鹿鸣》《驹虞》《伐檀》四篇。据所载,《鹿鸣》《白驹》为《小雅》,余皆二《南》。《南》《雅》或可通称。《伐檀》非《魏风》耶?何以亦列于雅乐耶?则谓十三国之诗不可入乐,谬矣”^[120]。据《大戴礼记·投壶》所载:“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鸣》《狸首》《鹊巢》《采蘋》《采蘋》《伐檀》《白驹》《驹虞》;八篇废,不可歌;七篇商、齐,可歌也;三篇闲歌。”^[7]²⁴⁴所谓“可歌”,也就意味着诗是有声律的。《伐檀》可歌,则该诗入乐,程大昌所谓“十三国《风》不入乐”之论显然为不实之论。

此外,朱熹的“淫诗说”也是钱澄之批判的重点。首先,钱澄之从声诗之辨的角度否认了《诗经》中存在淫诗。他指出:“若谓郑音即郑诗,卫音即卫诗,齐音即齐诗,十五《国风》,未有宋诗也。所谓‘燕女溺志’是何诗与?以声罪诗,误矣。”^[11]¹²钱澄之以此说明“郑声淫而非郑诗淫”之理,也说明了朱熹的“淫诗说”实为将声诗混为一谈的结果。其次,钱澄之从“诗教”的角度否认了朱熹所谓淫诗是“淫者自作”的说法。在被朱熹定为“淫诗”的29篇^①诗中,钱澄之只将《桑中》《溱洧》《月出》《泽陂》四首定为“淫”,但对于朱熹定《溱洧》为“淫奔者自叙之词”^[8]⁸⁷的说法,钱澄之并不接受,称:“诗辞详述士女相谑,皆从旁纪事之辞,盖诗人暴其事,以刺之耳”^[1]²²³。钱、朱之所以对此出现分歧,源于他们对诗歌性质的认定不同。朱熹对“淫诗”的解读“是从纯文本出发,求诗意于辞之中,清醒地认识到这类作品的特殊性质,指出其创作本身无关礼义,而只是当事人自言其事”^[9]⁸⁶,所以“彼虽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无邪之思读之。则彼之自状其丑者,乃所以为吾警惧惩创之资”^[10]³⁴⁴。反观钱澄之,以《泽陂》为例,钱澄之不仅不否认朱熹认为该诗“大旨与《月出》相类”^[8]¹³⁰的说法,还补充认为,“《月出》男思女之辞,此则女思男也”^[1]³³³。但钱澄之同时

也指出:该诗“言公(指陈灵公)之淫乱,使国人男女相悦,习以成俗也”^[1]³³⁴。可见,钱澄之对这类诗与汉儒强调社会教化的态度保持基本一致,没有将个人的男女之情当作注解的重点,而是突出此类诗中“刺”的指向,以“刺淫”的方式批判造成这种社会现象的政治背景^②。此外,钱澄之认为朱熹多以“淫诗”解读变风诸作的做法,是不知文学手法的结果,称,“朱子谓:‘诗辞轻佻狎昵,非思贤之音。改为淫奔之女,当风雨之时,见所期之人而心悅也。’夫轻佻狎昵,郑之声也。后人比物寄兴,皆托为男女之辞。若以辞害志,则屈原、宋玉之赋,皆淫邪之辞矣”^[1]²¹⁵。钱澄之认为,《诗经》中纵然多写男女情事之诗,但这类作品往往如屈、宋之赋,是以男女情爱相比附,若仅以“淫诗”视之,那么,此类作品真正的旨意和教化作用则无疑会被掩盖。

由上可见,钱澄之对宋学的批判多集中于宋人那些缺乏理据或影响经典权威的学说上,并非全盘否定宋学。相应地,钱澄之虽然有意凸显汉学的价值,强调汉学的权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目的是要使汉学压倒宋学。无论汉学还是宋学,对钱澄之来说实则都是他挽救经学的手段,他真正的意图在于通过抬高汉学地位的方式,借汉学之长来补宋学之弊,使经学正本归源,他的治学方式因此呈现出汉宋兼采的特征。

二、汉宋兼采的特征

皮锡瑞将清朝学术划分为三,其中“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柢,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11]³⁴¹。区别于此前大力攻诋诗经宋学的做法,“汉宋兼采”采用的是立足《诗

^①“淫诗”篇目的认定问题,在学界存在一定分歧,本文采用檀作文《朱熹诗经学研究》的观点,定“淫诗”为29篇,即《邶风·静女》《邶风·桑中》《卫风·氓》《卫风·木瓜》《王风·采葛》《王风·大车》《王风·丘中有麻》《郑风·将仲子》《郑风·叔于田》《郑风·遵大路》《郑风·有女同车》《郑风·山有扶苏》《郑风·蓍兮》《郑风·狡童》《郑风·褰裳》《郑风·丰》《郑风·东门之墀》《郑风·风雨》《郑风·子衿》《郑风·扬之水》《郑风·野有蔓草》《郑风·溱洧》《齐风·东方之日》《陈风·东门之粉》《陈风·东门之池》《陈风·东门之杨》《陈风·防有鹊巢》《陈风·月出》《陈风·泽陂》,详参檀作文《朱熹诗经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93-96页)。

^②钱澄之虽然对《诗经》中的男女之情秉持较为审慎的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否定《诗经》中个人情感的表达。钱澄之坎坷多难的人生经历以及他的遗民身份,决定了他的注经思想带有浓重的政治教化色彩。在此前提下,男女之情并不是他解读的重点。同时,钱澄之对诗作者个人情感的揣摩,多建立在他将自身经历代入反映政治、民生等题材的诗歌中。参看《论〈田间诗学〉中的“代入”现象》(《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

序》首句,以兼采众家之长的注经方法。这种保持中的方法看似客观,实则是在汉宋之间折中调停,为穷途末路的宋学寻求新的发展方向。清初奉行汉宋兼采的经学家们,即便有意发展汉学,但受制于宋学的根柢,他们也并不能以成熟、系统的方式建立汉学的体系。基于此,本节从钱澄之对汉、宋之学的偏重,论析《田间诗学》“汉宋兼采”的特征。

(一)对宋学的偏重

如上文所言,钱澄之有意识地树立汉学的权威性,所以他在《田间诗学》中倡导汉学,并以汉学来矫正宋学之弊。但是,汉学于钱澄之而言,并非治学的立足之本,而是更近于借以阐发个人对历史、政治以及圣人之言认识的工具。以钱澄之对十五国《风》次序的阐释为例,他认为《毛诗》所列的次序内含圣人深意,可以由此“观周室之世变”^{[1]18}。《毛诗》的次序,在王、郑、齐、魏、唐、秦的位次上与季札观乐次序和郑玄《诗谱》次序存在分歧。钱澄之则引其父之说,称:

自东迁以后,天下不知有周久矣。赖齐桓、晋文主盟中国,诸侯知尊王室,奉为共主者数百年。王者不作,天下何可无霸主哉!故次齐、次晋。魏之先于唐,犹邾、郟之先于卫。序诸先者,明其为所并也。秦虽不能争盟上国,然其君实足以霸。且晋之有晋,秦之功也,故次以秦。^{[1]18}

在此基础上,钱澄之又补充说:“《诗》以霸主而存,《春秋》因霸主而作,齐桓、晋文之功曷可诬哉!”^{[1]19}以史解《诗》的做法古已有之,但是钱氏父子借齐桓、晋文来称赞霸主,其意显然并不在于解读《国风》的次序。结合钱澄之在《三国论》中称赞曹操“迎天子都许昌,奉为共主”之举为“义”,并认为“设使操当日不迎乘舆,委天子于群凶之手,汉之亡久矣”^{[12]30-31},可知,称赞霸主之功其实是钱氏父子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的政治观念。钱澄之在《十五国风论》中着力证明《毛诗》次序的正确性,而钱澄之将其引入诗经学中并借题发挥,明显更接近于宋人借经说理的做法。

此外,就《诗序》的问题来看,钱澄之对以师承著称的汉代经学家也并非完全信服。他认为《诗序》可信的只有诗题下的首二句,其余则均为卫宏之《序》,是“即其说引而伸之”,多附会之说,所以“不敢概从”^{[1]5}。他还指出,“若《小序》两

语,自属毛公所师授,毛公本之以作《传》者也。郑康成为《笺》,以畅毛公之说。孔仲达复为《正义》,并演郑氏之旨,于是毛《传》始益大明。然郑与毛亦时有异同,大抵郑信讖纬,故多异说,未若毛《传》之醇正也”^{[1]5}。《诗序》仅首二句可信的说法,自宋代已有之,是典型的折中汉宋的做法。钱澄之虽以首二句为准,但《田间诗学》所定诗旨与《诗序》首二句存在分歧的,多达六十余首。钱澄之这种既相信又怀疑的矛盾态度根源于他的学术根柢。

钱澄之的经学根柢为宋学,这在他早年的治学倾向中有明显的表现。如他在《〈通雅〉序》中所言:“吾人读书,观大义而已。若夫研阴阳之理,穷天人之故,考政事之得失,辨学术之异同,以及古今制度之异宜,中外风土之殊俗,如子所载者,吾以尽心焉。至于器数之末,诂释之烦,点画之细,世自有窳句博物之徒,子何以役志为?”^{[12]228}“天人之故”“政事得失”等问题正是宋学所长,而名物、诂释等则更近汉儒之学。可见,钱澄之早年并不热衷于从事章句训诂的汉学,而更近宋人治学的方式。再者,钱澄之的《田间诗学》始撰于1675年春,在此之前,其易学著作《田间易学》方初步成书,在该书中,钱澄之直言不讳地说,“兹所引者,取其与宋儒旨不相悖,或有以开宋儒之先,或足与互相发明者,要以程《传》及《本义》为据”^{[13]1}。此外,该书中如“吾心即天地之心”^{[13]342}、“神明之者,心与《易》契,言语道断”^{[13]652}等带有心学色彩的观点比比皆是^①。

理学、心学对钱澄之的影响,在他的《田间诗学》中也有显著的表现。《田间诗学》中所引较多者,基本上都是宋元明之学者。这类学者受宋学影响较深,即便其中有一二如季本、郝敬等有意复归汉学者,他们诸多抨击宋学的观点也被钱澄之以折中调停的方式阉割。如钱澄之曾批评郝敬治《诗》之法,称,“特郝氏拘定《序》说,《序》有难通者,辄为委曲生解,未免有以经就传之弊;而又立意与《集传》相反,不得其平”^{[1]6}。郝敬以恢复圣人之道为本,将朱熹之论弃置不用,这种治《诗》之法固然有失公允,但在被宋学笼罩的社会背景下,非极端的手段不能矫宋学之弊。然而,宋学的

^①《易》是钱澄之家传之学,其家学传统最早可以追溯至宋代的钱时。据《宋史》所载:“时字子是,淳安人。幼奇伟不群,读书不为世儒之习。以《易》冠漕司,既而绝意科举,究明理学。”(详参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292页)钱时是陆九渊弟子杨时的门人,钱澄之承其余绪,故治《易》学多有理学的印记。

沉痾在钱澄之看来并不是可以罔顾真理的理由,他坚持“至于注疏传注,诸儒之说,未尝专循一家:朱子《集传》凡从郑夹漈说者,概不敢遵;若毛氏之附会,郑氏之穿凿,皆力辟其谬,亦各从其是者而已”^{[12]86}。朱熹注《诗》讲求“在讽诵中见义理”^{[14]2612},所以往往能从诗本身出发,指出《序》的附会之处,如《郑风·羔裘》,《序》称该诗“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风其朝也”^{[15]341}。而朱熹则称:“《序》以变风不应有美,故以此为言古以刺今之诗。今详诗意,恐未必然。且当时郑之大夫如子皮、子产之徒,岂无可以当此诗者?但今不可考耳。”^{[8]30}朱熹跳出所谓“风雅正变”之说,从诗文本身立论,正是对《诗序》附会做法的反拨。虽然郝敬坚持“此诗刺大夫立朝不称其服,而朱子改为美大夫,盖误以‘彼其之子’为美辞”^{[16]175},但钱澄之并未采用郝氏之言,他认为该诗中的“彼其之子”是“能临难捐躯”的正直庄严之人。他因此延续了朱熹“美其大夫”之言,并据史将该诗所美者定位郑大夫叔詹^{[1]198}。可见,钱澄之的批判郝敬治《诗》的偏向问题,也只是针对郝敬一概抹杀朱熹之论的做法而言。

钱澄之对明末学术之弊有着十分清醒的认知,但他并没有因此对各家之学有全盘接受或一概抹杀的取向。究其根本,实则是受他欲“辨其时代之异同与情事之疑信”^{[1]198},以还原经学本貌的治学态度的影响。

(二)立汉学权威而多承袭

钱澄之兼采汉宋之学的做法离不开何楷对他的影响。钱澄之在《田间诗学·诗学凡例》中说:“是编自乙卯春始事,家无藏书,命儿勃禄从友人家搜录诸本,择其粹精者,手自编辑,凡七易稿,始成。”^{[1]8}又说:“晋江何玄子先生作《诗经世本》,向谪南曹,时劄劄甫竣,即持以示余,使为校订。……何先生授余以《易》,又授以《诗》,其教不敢忘也。故存录者多,而亦时加辨论。”^{[1]6-7}可知,钱澄之撰《田间诗学》时,所能供其使用的书籍资料有限,而何楷的《诗经世本古义》所含资料甚多,再加之何楷曾教授钱澄之《诗经》,所以,《田间诗学》大量承袭了何楷之说。该书中以“何氏云”“何氏谓”“何氏以为”等明确引用何楷观点之处,就有114处之多。而该书中更多的是直接化用、承袭却不注明为何楷之说的情况。如《祈父》一诗,钱澄之将该诗背景定为“宣王二十九年”^{[1]477}的千亩之战,相关年份曾引《周语》为据。

然而,据《周语》所载:“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17]21}巧合的是,钱澄之将“三十九年”写作“二十九年”的失误,在何楷的《诗经世本古义》中也存在同样的情况。何楷之书成书在前,因而钱澄之此处应当是承袭何楷之误而成。此外,如对《河广》诗义的断定,钱澄之的按语称:

按,《说苑》:“宋襄公为太子,请于桓公曰:‘请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对曰:‘臣之舅在卫,爱臣若终立,则不可以往。’”不曰欲见母,而曰欲见舅,恐伤父之意也。合此诗观之,母之慈,子之孝,皆止于义,而不敢过焉。^{[1]154}

何楷在注解此诗时,引《说苑》与吕祖谦之言,称:

刘向《说苑》云:“宋襄公为太子,请于桓公曰:‘请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对曰:‘臣之舅,在卫爱臣,若终立,则不可以往。’”吕祖谦云:“味此诗而推其母子之心,盖不相远,所载似可信也。不曰欲见母,而曰欲见舅者,恐伤父之意也。母之慈,子之孝,皆止于义,而不敢过焉。不幸处母子之变者,可以观矣。”^{[18]1718}

对比二者可见,钱澄之的按语承袭了何楷所引《说苑》的内容,同时又化用了吕祖谦的部分观点,两部分文字顺序、逻辑不变,当为钱氏承何楷注解。又如将《南山有台》定为“文王养老之诗”的观点,钱澄之称:“郑玄谓:‘春入学,舍菜,合舞。秋颂学,合声。’于是时也。视学则遂养老。此章万寿、眉寿、黄耇等语,皆为养老咏也。据《乡饮酒礼》《燕礼》,笙入而后皆间歌此诗,则周公未作《仪礼》之前已有之,故朱子以为燕飨通用之乐”^{[1]432}。何楷对该诗主旨的阐释,称:

按文王立教,最重养老。《礼·文王世子》篇云:“凡大合乐,必遂养老。”郑玄谓:“春入学舍菜合舞,秋颂学合声,于是诗也,视学,则遂养老。……《南山有台》之篇,据《乡饮酒礼》《燕礼》,笙入而后,皆间歌此诗,则周公未作《仪礼》之前已有之。故朱子以为燕飨通用之乐歌。而其首二章,则祝君子曰:‘万寿无期’、‘万寿无疆’,末二章,则又赞之曰:‘遐不眉寿’、‘遐不黄耇’,此非为养老发咏而何?”^{[18]227-228}

从二者对比中不难看出,钱澄之用来证明该诗主旨在于“养老”的郑玄之论、《乡饮酒礼》《燕礼》的相关内容均是何楷在其书中所引,而引文之外对“万寿”“眉寿”等句的阐发,也化用了何楷的按语。再如《十月之交》一诗,钱澄之认为该诗当为“刺幽王”而作。他指出:“《竹书纪》:‘幽王元年,锡皇父命。二年,泾、渭、洛竭,岐山崩。三年,王嬖褒姒。冬,大震雷。四年,夏六月,陨霜。五年,王世子宜臼奔申。皇父作都于向。六年,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其事与此诗及《正月》之诗合。何氏云:‘皇父以幽王五年作都于向,而郑桓公至幽王八年方为司徒,正是皇父祖向后,故以友代之耳。’”^{[1]509-510}钱澄之所论,除“何氏云”之后的内容以外,所引《竹书记年》的相关论据也均与何楷书中一致。凡此种种,在《田间诗学》中不胜枚举。可见,钱澄之《田间诗学》中融合汉学和宋学的特征并非完全由个人意趣所决定,还受到了他引书情况的影响。甚至,《田间诗学》中诸多效法汉儒考据诗文的内容也并不完全是钱澄之个人的观点。所以说,不可仅以钱澄之书中诸多运用汉儒之法的内容就认为钱澄之本人对汉儒之学的重视程度如何。当然,从钱澄之大量征引、沿用何楷考据之论,仍可以看出钱澄之出于对诗义本貌的追求,促成了他对汉、宋之学兼收并蓄的态度。

就钱澄之所引何楷之说的情况来看,所引内容多被用作考据的论据。而何楷所作的考据之功也服务于钱澄之注经的活动。如对《卷耳》之《序》中“求贤审官”的解读,何楷引刘敞之言,以“盖后妃于君子,有夙夜警戒相成之道,此诗言警戒人君之意,不谓自己求贤审官也”^{[18]215}的说法,来回避后妃干政之嫌。钱澄之诗后的按语也认为:“后妃……安有干预朝政与闻人主求贤审官之事?……至《卷耳》则正小君之位已久,将以助成王化,则求贤审官之事,亦宫中所时宜劝傲也。”^{[1]12-13}钱澄之所言与何楷所引,均意在以劝诫之意来模糊“求贤审官”的干政意味。再看该诗中对“周行”的解读,《毛传》认为“行,列也。思君子官贤人置周之列位。”^{[15]44}郑玄也称:“周之列位,谓朝廷臣也。”^{[15]44}这显然是对《诗序》中“进贤”问题的呼应。何楷“欲君子敷求哲人布满有位,亦惟恐朝之不盈”^{[18]216}的观点,沿袭了毛郑“周之列位”之说。而钱澄之则采用了朱熹释“周行”为“大道”的观点,认为“周行,大道。置诸彼,

明有怀也。以独采不如共采之易为力,喻求贤之宜亟也”^{[1]11}。如前文所言,何楷凸显后妃“不谓自己求贤审官”,但“恐朝之不盈”之意仍然没有摆脱“干政”之嫌,所以钱澄之则更退一步改称“求贤之宜亟”。从钱澄之的注解中,可见钱澄之对《诗经》的解读较何楷之说,更注重对礼教纲常的维护。

又如《小雅·四月》一诗,何楷的《诗经世本古义》认为该诗属周厉王之世,是“孝子叹征役而思祭”^{[18]934}之诗。钱澄之则认为:

《孔丛子》载:“孔子曰:‘于四月,见孝子之思祭焉。’”《左传》:“文公十三年郑伯会公于棗,请平于晋。与公宴,子家赋《鸿雁》。季文子赋《四月》。”杜注:“谓义取行役逾时,思归祭祀,不欲为还晋。”则文子赋诗之意,与孔子思祭之说正合。愚按:《渐渐之石·序》亦曰:“下国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将率东征。”疑此诗当作于此时。故有江汉南国之语,观诗忧乱之情多,而苦役之意少,至思祭又苦役,意中之一端耳。^{[1]563}

钱澄之所引《孔丛子》《左传》以及《渐渐之石》的相关内容,《诗经世本古义》均有提及。其中,关于所引《左传》的内容,并非《左传》原文,而是何楷概括此事之言。虽然论据相似,但钱澄之只认可了何楷的“思祭”说,并融合了朱熹“遭乱自伤”说,认为该诗“忧乱之情多”。所以,在注该诗时,钱澄之侧重于揣摩诗作者个人情感的角度,在他的解读中“死亡不保,而朝廷曾不知有我,宁念我先祖之乏祭乎”^{[1]566}、“举世皆病,恐役返亦无所归矣”^{[1]564}等自述其情的表述犹多。反观何楷,在述说作者感慨“今我尽瘁以从仕,而曾不我有”之后,又强行将这种情感与“倦倦不忘君”相联系。可见,何楷有意地回避他所挖掘的个人情感,并以讽谏劝世作为这种个人化的现象的最终指归。钱澄之则与之不同,他认为“诗者,性情之事也”^{[12]231}(《庄屈合诂自序》),《诗经》本质还是诗歌,所以“虽曰研经,亦思有以晓夫世之侈口风雅者,使自得诸其性情也”^{[12]88}(《与张敦复学士书》)。钱澄之注《诗经》对诗歌个人情感的解读,是他与何楷最大的不同。可见,钱澄之对何楷《诗经世本古义》的承袭,总体上还是以借鉴材料和论证方法为主,并没有完全承袭何楷对于诗歌

意义及具体内涵的解读。

综上所述,钱澄之治学兼采汉、宋特征的形成,受到师学、个人意趣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同时,汉学在明末清初尚未盛行,再加上钱澄之受限于他的学术根柢更偏向于宋学,所以即便他有意兼采汉、宋,他治学思想也还是更多地受到了宋学的影响。

三、汉宋兼采的学术史意义

明中叶以来,在种种社会矛盾逐渐激化的背景下,流于空疏的理学、心学成为众矢之的。学者们为经学的发展谋求出路,无论是倡导汉学,还是选择汉宋兼采,抑或是坚持宋学的路径,均需要面临如何解决理学内部矛盾的问题,即解决“尊德性”与“道问学”之间的关系问题。

“尊德性”与“道问学”是宋明儒者探求义理的两条途径。在朱熹与陆九渊的时代,此二者的矛盾的表现也就是治学“向内求”与“向外求”之间的分歧。在义理之学盛行的背景下,朱熹强调只有精熟经典才是将圣人之意学以致用的关键所在,只有“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才能“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19]7}。而陆九渊则着眼于内在的“涵养磨励”之功,并认为“道问学”应服从于“尊德性”：“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20]400}陆九渊强调发挥了闻道致用的内在方面,使“道问学”从属于“尊德性”。到了朱学在科举的影响下日渐势弱的时代,王阳明进一步发展了陆九渊之说,提出“道问学即所以尊德性”^{[21]151}、“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21]309}的论点。其实,王阳明并没有要抛弃经典之意,之后左派的王学家才真正将经典抛开而空谈心性。钱澄之看到了陆、王之学本身重视经典的一面,所以他并不认同将王学一概视作废药猛兽的做法。钱澄之因此批评顾炎武,称:

宁人学问淹博,弟不能窥其万一,但似详于事而疏于理,精于史而忽于经。经如《春秋》说,不谓不精,要亦史类也。弟尝与论《易》,辟象数而主义理,谓程《传》、朱《义》外不宜更有见解,不省程《传》但言义理,朱子兼通象数,《本义》之外,复有《启蒙》,故曰程演周经,邵传义画,则宁人于程朱之异尚未深悉,弟故以为于经忽也。至于稽古之勤,考证之核,近世罕有其匹,意目力所到,应无遗编,而顾先生《小心斋札记》独未之见,

又可怪也。^{[12]70}

程颐治《易》并非完全抛却象数,而是将义理与象数视作源与流来理解;同时,朱熹兼通象数与义理,其《易学启蒙》即着力于象数。但是顾炎武“辟象数而主义理”的思想,无疑阉割了程、朱易学,钱澄之因此称顾炎武“于程朱之异尚未深悉”。顾炎武只知批判王学,却不知被他视作正学的顾宪成尚能在其著作中征引阳明之说,可见顾炎武对王学也知之不深。钱澄之因此提出,把“尊德性”与“道问学”提到同一高度。他认为:“阳明宗象山,象山与考亭异者,吴幼清以为一主尊德性,一主道问学也,圣人之学具是二者。今谓主其一,岂即废其一耶?亦其所从人不同耳。读书而有悟,与悟后之读书何以异哉?”^{[12]70}朱学与陆、王之学的区别在于从入的门径不同,所以钱澄之重新将“尊德性”与“道问学”拉回到同一层级,以追求圣人之为旨归,走的是调和二者的路子。

钱澄之与顾炎武辩证“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关系,本质上还是对经学与理学关系问题的讨论。顾炎武认为:“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校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又曰:‘《论语》,圣人之语录也。’舍圣人之语录,而从事于后儒,此之谓不知本矣。”^{[22]58}顾炎武所针对的,是当世不尊六经、鄙薄《诗》《书》的空疏治学之法;所倡导的是朱熹那种“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治经方式。顾炎武因此说:“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22]58}当然,顾炎武所言,“并不是说‘理学’等于经学,而是‘理学’是经学的一部分,言理应本之于经而已”^{[23]24},所以要从经典中求道,以“道问学”为主导。在此背景下,当钱澄之提出顾宪成引阳明之说注《大学》《中庸》时,顾炎武不知有此,却以为钱澄之陷于王学之说不加考证,责钱澄之“于此甚浅”^{[12]69},其实也是出于尊奉“道问学”的原因。实际上,钱澄之并不疏于“道问学”方面,他坚持“于六经之奥义无有不探,史籍所载无有不窥,于古今是非邪正之辨、时势之推迁、物理之变易、人事之得失,一切无有不究,洞洞瞩瞩,无所疑滞于其中”^{[12]249}。可见,钱澄之治学还是遵循着“读书穷理”的方法。而他在文中所谓的“无有不究”,就治《诗经》来看,即他在《与张敦复学士书》中说:“列国之封域、山川之形势变迁不一,即今之舆志以考古之图经,而参以平生之所亲历,则郑《谱》言之不详,而图经所载亦未确也。若夫义理

文句之奥,诸儒多以臆测,朱子置为未详,细绎经旨,本自分明,循理据实,绝无牵强,于是或发先儒之所未发,或先儒见及之而说未能畅者,则极言以畅之”^{[12]86}。钱澄之对《诗经》义理的解读,建立在博览史籍的基础上,这种“辨其时代之异同与情事之疑信”^{[12]86}的态度,正是对他所谓“圣人之学兼具二者”的践行。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顾炎武强调“道问学”的治经方法,还是钱澄之兼具二者的方法,都对之后治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帮助。顾炎武认可的圣人之道是“博学于文”,所以他认为“命与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与天道,子贡之所未得闻也。性命之理,著之《易传》,未尝数以语人。其答问士也,则曰‘行己有耻’;其为学,则曰‘好古敏求’……呜呼!圣人之所以为学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学而上达。’”^{[22]40}顾炎武认为,圣人并没有专心于内的学问,对内定之功的强调,不过是宋、明儒者的说法而已。从顾炎武所倡导的“博学于文”“好古敏求”的治学方法不难看出,他所倡导的正是尊奉“道问学”的学风,“学者社会尊考据而鄙薄宋学,于是学界遂踵武亭林而发展之”^[24],至乾隆年间,即发展成为蓬勃的考据之风。反观钱澄之,他所谓的“道问学”是与“尊德性”相辅相成的,也就是他所谓的“读书而有悟,与悟后之读书,何以异哉?”^{[12]70}从他注《诗经》来看,虽然他杂采前儒之说而略显驳杂,但是,从他兼采汉宋之说的实践中,仍可见一种试图将义理与考据相融合的方法。与之相近的,还有持“藏理学于经学”的方以智。方以智认为王学与朱学一主虚,一主实,都是难达“化境”的方式,因此要“学必悟而后能变化,悟必藏于学而后能善用同人”^{[25]87}。此外,方以智还对考据提出建议,称:“书不必尽信,贵明其理。或以考事,或以辨名当物,或以验声音称谓之时变,则秦汉以来之所造所附,亦古今之征也。……若嗜浅恶深,一切疑之,永叔疑《文言》,象山、慈湖疑《系传》,至今郝京山、何元子信文王《八卦》而疑伏羲《先天图》,岂不可笑?”^{[25]5}上述学者的考据功力虽然并不能与乾嘉时期的考据大家同日而语,但是正如林庆彰先生所言,“如果没有明人自创体例,作为后人研究的基石,则清初恐无法达到那么高的学术水平”^{[26]142}。

后世往往将明末汉学的复兴与明遗民学者在

明亡后反思明朝学术空疏相联系,抑或认为与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有关,如此一类解释均有其可取之处,但又似乎未能触及关键。在明清鼎革之际,异族对中原文化的侵袭,不仅包括对人民的屠戮,还有对原有文化体系的践踏与摧残。在“亡天下”的危机笼罩之下,经学典籍无疑成为凝聚民族共识、承载民族文化的不二选择。所以匡正经义、还原经学本真就成为此一时期士人之责,即无论汉唐还是宋明的学术体系,均作为还原经义、传承经学的工具而存在。与此同时,《诗经》中原有的美刺教化之用,也成为不得志的遗民学者寄寓经世、处世之策的载体。当然,也应看到,清代诗经学并未沿着这些遗民学者经世的治学旨向发展,“在多数乾嘉学者之中,立言不过是为通经而通经,为学问而学问,它并没有承载立德与立功的重负,立言本身就是目的”^{[27]149},清初如钱澄之等学者为家国而治学的用意,也早已淡出他们的视野。

参考文献:

- [1] 钱澄之. 田间诗学[M]. 合肥: 黄山书社, 2005.
- [2] 脱脱. 宋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3] 王鏊. 震泽先生别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 [4] 祝允明. 怀星堂集[M]. 杭州: 西泠印社出版社, 2012.
- [5] 钱谦益. 牧斋初学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 [6] 程大昌. 程氏考古编[M] //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全宋笔记: 第四四册[M].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19.
- [7] 王聘珍. 大戴礼记解诂[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8] 朱熹. 诗集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7.
- [9] 檀作文. 朱熹诗经学研究[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3.
- [10] 曾枣庄, 刘琳. 全宋文[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
- [11] 皮锡瑞. 经学历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12] 钱澄之. 田间文集[M]. 合肥: 黄山书社, 2014.
- [13] 钱澄之. 田间易学[M]. 合肥: 黄山书社, 2014.
- [14] 黎靖德. 朱子语类[M]. 王星贤,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15] 孔颖达. 毛诗正义[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 [16] 郝敬. 毛诗原解·毛诗序说[M]. 北京: 中华书局, 2021.

- [17]徐元诰.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2.
- [18]何楷.诗经世本古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
- [19]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20]陆九渊.陆九渊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21]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5.
- [22]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23]何冠彪.明末清初学术思想研究[M].台北:学生书局,1991.
- [24]路新生.“尊德性”还是“道问学”?——以学术本体为视角[J].天津社会科学,2008(4).
- [25]方以智.通雅[M]//方以智全书:第一册.合肥:黄山书社,2019.
- [26]林庆彰.明代经学研究论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 [27]边家珍.经学传统与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形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On the Scholarly Orientation of *Tian Jian Shi Xue*

HAO Miao

School of Litera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Qian Chengzhi intentionally emphasized the scholastic transmission tradition of Han Confucianism and accentuated its contributions to preserving classical scholarship in his *Tian Jian Shi Xue*, so as to break through the dominance of Song Confucianism on academics over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and to reestablish the authority of Han Confucianism. However, because Qian Chengzhi's personal education favored Song Confucianism, his critiques of it remained overly conservative. On the other hand, his impoverished living conditions in later life, coupled with his commitment to transmitting his teacher's scholarship, resulted in extensive borrowings from He Kai's *Shi Jing Shi Ben Gu Yi*, which affected the expression of the personalized characteristics of his own *Tian Jian Shi Xue*. However, in *Tian Jian Shi Xue*, Qian Chengzhi responded to the dialectical problem of “respect for virtue” and “Taoist learning” since the Song Dynasty by way of his commentary on the scriptures of critical adoption of the studies of the Han and Song Dynasties. His work made useful explorations of the inheritance of scriptures in the Qing Dynasty.

Key words: *Tian Jian Shi Xue*; Qian Chengzhi; study of the *Book of Songs*; critical adoption of the studies of the Han and Song Dynasties

(责任编辑 雪箫; 实习编辑 李泓晓)